落实“四个全面”须提升文化力

□王克修

“四个全面”是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根本问题和工作重点。强调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意在把人们的无谓之争引导到集中解决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上来，把人们一些短视、碎片化和满足于枝节的倾向引导到关注我国长远发展、全局发展、根本发展上来。

文化是人类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的总称，它和经济、政治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有机体中，经济是政治和文化的物质基础，构成人类文明发展的物质形态；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构成人类文明发展的社会体制形态；文化是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构成人类文明发展的精神形态。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其量的程度和质的水平，反映着一定时期经济、政治的状况，又以巨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推动经济、政治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从而增强国家的实力。人类文明越发展，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就越加突显。在当今人类社会，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必需战略资源中，文化已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与民族强大与否，既取决于经济实力，也取决于文化实力；同样，一个政党能否取得执政地位并牢牢掌握政权，不仅视其拥有的经济、政治资源，也取决于它所掌握的文化资源。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世界各国特别是正在向现代化目标艰难迈进的发展中国家，对文化的作用和力量认识得更为明晰。例如，过去的发展战略研究者们往往将文化因素的发展指标，诸如人的现代化素质、科技教育水平、社会的民主与法制建设、社会改革活力、民族文化精神、国家与民族形象等，划定为潜在因素或软指标范围，而现在则被视为对增强综合国力具有决定意义的现实因素。在当今现代化研究中，文化力与经济力同等重要地被认为是现代化实现程度的硬指标，没有相当的文化力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现代化。显而易见，没有文化的人，没有文化的经济，没有文化的政治，没有文化的改革，没有文化的法治，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中外实践已证明，文化力是现代化的巨大推动力。

要从文化的深层次上研究，如何利用文化力起到更好的作用。从文化的高度确定战略和策略，增强竞争力，发挥文化在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作用。我们说的文化力是指在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活动中，以人为主体所蕴涵的，并通过人的活动整合和显化出来的一种物质力与精神力多层结合的综合力。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智力因素，包括教育和科技在内。二是精神力量，包括理念、信仰、道德、价值观、精神等等。这些是无形的，又是能动的，时刻都在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发生影响和作用。它是看不见的力，但力大无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都必须从文化中汲取营养，只有把文化营养与现代社会需求很好融合，才能形成我们的时代文化力，从而形成我们发展的硬实力。

在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文化繁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文化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驱动力，法治文化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要素，先进文化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精神支柱。整体推进文化建设，为实现“四个全面”打造强大的文化力。积极适应新常态，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推动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人民群众是创造主体，改革创新是动力源泉。法治文化是指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中生长出来，经过长期社会化过程积淀下来的，人们对法律生活所持有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包括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思想、法律价值取向等内容。法治文化意味着法治精神得以普遍化地实践和实现，社会活动是按照法治精神实践的方式、过程和实现的结果。全面从严治党，离不开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树立先进典型，弘扬新风正气，打击歪风邪气，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这不仅将文化提到了强国的层面，更进一步阐释了“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目的是通过先进的文化来教育人民大众，让文化为“四个全面”服务，通过文化的发展来推动整个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四个全面”说起来复杂，实际上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让人民生活更幸福，更美好。但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并不是一件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注定要打几场攻坚战和持久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每个人的利益，需要每个人的参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每个人、每个家庭物质和精神财富的迅速增加，并积极帮助其他人共同致富是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全面深化改革更是涉及千家万户，需要每个人积极投身改革、推动改革，着眼长远利益，不为当前的既得利益所束缚，不做改革的绊脚石。全面依法治国是为了保障最大多数人民的福祉，需要每个人积极提高法治意识和素养，积极有序参与法治建设进程，加强对政府部门和司法部门的监督，推动建设一个人人守法、和谐有序的社会。作为十几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党的形象、党的战斗力关乎每个人的利益。因此，要求每个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同时积极参与对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的监督，消除他们中的腐败分子，净化党的队伍。

（作者单位：湖南省委党校）

从政德为本

□康井泉

“百行德为首”。德是做人、做事、从政的基础。官德是领导干部政治素养、思想品德、知识修养、道德情操、组织才能等内在素质的综合体现。官德是为人之魂、成事之基、用权之道、从政之本，本固则德高，德高则众从，众从则威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中国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都认为，立德是立身、立业、做人之本，官德是为官从政之本，所谓“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患禄之不厚，而患知之不博”，以此作为判断官德人品的价值标准。《左传》提出：“德，国家之基也”，把培育高尚的美德视作“立国”的根基。孔子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把“德政”形象地比作众星围着北斗星那样获得黎民百姓的拥戴。孟子说：“不仁者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荀子有言：“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管子》称“授有德则国安”。东汉王符说：“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西汉刘向有：“德不厚者不可使民”，这些从反面说明无德之官害国害民。唐太宗说：“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宋臣陈师道诗云：“百年富贵今谁见，一代功名托至公”。宋代王安石：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金臣元好问诗云：“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清代郑板桥：“种十里名花，何如种德；修万间广厦，不若修身”。孙中山说：“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这些思想强调的都是修身正己立德从政的重要作用，由此也可看出，千百年来，我们这个民族就一直充盈着道德的良知、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官德标准是什么？我认为，官德应包括“三德”：大德、业德、品德。“大德”就是坚持党性原则，忠诚于党，理想信念坚定，树立旗帜鲜明的政治形象。从实践党的宗旨和推动党的事业的高度，坚持认真学习党的科学理论，高度重视和加强官德修养，塑造好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以自身的模范行为，有效履行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使命。“业德”就是坚持为民原则，履职尽责，推动事业发展，树立勤政实干的公仆形象。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践行“为民、务实、清廉”“忠诚、干净、担当”的总要求，切不可“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品德”就是坚持道德准则，廉洁奉公，增强人格魅力，树立公正无私的廉洁形象。具备了良好的道德品格，就会有光彩和魅力；拥有了良好的道德操守和人格力量，就能不令而行、造福一方。

怎么涵养官德？官德莫忘“严”与“实”，只有按照“三严三实”的要求，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才能将他律变为自律，变外在的规则为内在的价值。要从履职尽责中践行、从权威教诲中领悟、从典型身上学习、从古代文化中汲取。特别是在各种诱惑面前要明大是、有定力、敢亮剑，正如清代监察御史杨维乔在东汉著名的“一钱太守”刘宠墓前的题诗：“居官莫道一钱轻，尽是苍生血作成。向使特来抛海底，营波赢得有清名。”

但丁说：“道德常常能填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缺陷。”周恩来也曾经说过：“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因为只有老实人，才能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检验。”邹韬奋有言：“天下作伪是最苦恼的事情，老老实实是最愉快的事情。”官德是知、情、意、行的统一。只要我们秉承理想信念、充实理论知识、磨练意志、充满激情、履行责任，就能够一身正气、为民履职。我们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信念的圆点；我们所抵达的地方，正是我们事业的半径；我们共同创造的世界，正是为政为官、勤政为民的梦想之“圆”。

（作者系北京市大兴区委党校副校长）

话说“敢读书”

□赵 畅

记得著名作家王蒙说过：“要敢读书，敢读自己不完全能够把握的书。不要老读比你智商还低的作者的书。”此番话语，颇耐人寻味。

为何言“敢读”？是因为这些书对于读者是“自己不完全能够把握的书”。既然“不完全能够把握”，那么，心里难免会有担心和畏惧。其实，就如孩子学走路一样，一开始总是会跌跌撞撞，不可能一走就会、一学就成。然而，恰恰是跌跌撞撞地不断积累，便渐渐摆脱大人的扶助，始学会独立行走，以至学会奔跑。读书亦然，如果一直读比自己智商还低的作者的书，不要说自己难以进步，说不定连原来的那点知识积累和对于世事的悟性老本，也会因之而消蚀。从这个意义上说，“敢读书，敢读自己不完全能够把握的书”，不啻是一种勇气的体现，亦是一种智慧的表达。

是的，手捧一本“自己不完全能够把握的书”，要啃下来，就得花功夫。不聚精会神、刻苦钻研是不行的，不甘当学生、虚心请教是不行的，不勇于质疑、善于积累是不行的。而这“啃”读的过程，究其实，就是一种科学读书、获得知识的过程。这般“啃”读，必引导读书人由易到难、由低到高获取知识，并渐渐登上智慧的殿堂。

读报，看到一个报道：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认为，“曹冲称象”的故事为假。依据是当时气候寒冷，孙权控制的南方已经没有亚洲象，又怎么能进贡给汉室大象？暂且不论陈寅恪先生的结论正确与否，真正读懂早有定论的“故事”以及陈寅恪的“质疑”，我们不该调动自己已有的知识并多方求证，作出属于自己的科学判断吗？这样的读书，哪怕只是对一个小小知识点的把握，其效果不知要比读一些道理浅显且很难让自己留下任何知识记忆的书好上几倍、几十倍。坚持这般读书，不仅会有效地链接知识点，逐渐替自己编织成一张庞大的知识网络，而且还能够帮助自己积淀起刻苦攻读所必需的坚忍不拔的品质、举一反三的悟性以及善读善成的信念。

哲人说过：“一个境界低的人，讲不出高远的话；一个没有使命感的人，讲不出有责任感的话；一个格局小的人，讲不出大气的话。”读书，我们就是要站在“巨人”中间，以此去体味“高远境界”“责任使命”“大气格局”的内涵。书籍的“巨人”不是别的，正是那些“人类各个时期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最高智慧的结晶和精神丰碑，各个民族不同时期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最高智慧的结晶和精神丰碑，各个民族传统文化最突出、最重要的承载与传播因素”。一个人，若能坚持读经典，坚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观察、思考问题，便能收到事半功倍的读书效果。即便不能成为大家、大师，自己已然在时时向大家、大师靠拢。

茅盾文学奖得主迟子建说过：“作家重要的是要不断面对有难度的写作，你以为切近了理想之境，可到了近前一看，那个境界还远着哩。”如果说，作家追求“有难度的写作”，是为了“切近理想之境”的话，那么，读书人之读“自己不完全能够把握的书”，则是为了拓宽更为广阔的视野，增添更多能动的见识。天有涯而知无涯，读书人只有勤读书，多读敢读“自己不完全能够把握的书”，才能气象宏阔、满腹经纶。

然而，在我看来，真要做一个“敢读书，敢读自己不完全能够把握的书”的人，必须是求知若渴的人——就像“饥饿的人扑倒面包上一样”。否则，便是空话，充其量，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想起上个世纪30年代，北大有一句话：“正式生不如旁听生，旁听生不如偷听生。”旁听生指没有选这个课的的北大学生，偷听生指根本不是北大的学生。有一次，胡适之先生在课堂上问：“你们哪位是偷听生？没关系，能来偷听更是好学之士。我只希望你们能给我一个名字，是我班上的学生。”我无以忿愚人们去做大学的偷听生，而是与胡适之的感觉一样，偷听生“更是好学之士”。读书，若能涌现一批一大批“偷听生”，则善莫大焉！

随 笔



宁夏区委党校正门

校园风光

做“互联网+”的积极行动者

□朱永刚

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这一行动计划，关乎一个全新概念“互联网+”。那么，“互联网+”究竟是什么，对人们的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人鼓舞、有人疑惑，值得深思。面对“互联网+”，我们应该做什么？

做学习者。于大多数人而言，“互联网+”是陌生的、崭新的。要认识它、适应它、把握它，唯一的途径就是加强学习，不断地学习。依托于读书，着眼于实践中的问题，阅读研究分析关于互联网的书籍，观察思考感悟工作生活中与互联网紧密相关的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上，了解“互联网+”是什么，认识“互联网+”将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何种影响，深谙面对“互联网+”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若不主动学习，不仔细阅读互联网方面的书籍，分析研判互联网时代的形势发展，自觉提高学习力，面对“互联网+”，难免会有盲人摸象，甚至力不从心之感。做学习者，就要坚持运用好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共产党人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要始终使用好“学习”这一共产党人走向成功的秘密武器。唯其如此，才能生长出面对“互联网+”的那份底气与从容。

做创新者。“互联网+”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中央依据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对当前形势所做出的重大决断，是我国经济发展所迎来的新时代，是新常态下的新业态。新时代新业态，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该如何迎接“互联网+”，抢抓“互联网+”的宝贵机遇？作为新科技革命的大势所趋，“互联网+”对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在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我们已经不能再躲在旧体制、旧观念的狭小空间里了，而应打开创新思想观念与体制机制的广阔天地，去拥抱属于创业创新的梦想。做创新者，必须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精神，树立敢为人先的锐气，上下求索的执著，得风气之先、开风气之先，创新思维、优化行动，正确发挥“互联网+”的积极作用，消除其产生的消极后果，让“互联网+”的有力杠杆，推动社会发展获得更大进步。

做服务者。毋庸置疑，“互联网+”对共产党员服务能力与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共产党人之所以坚持学习，不断创新，追求卓越，唯一目的就是服务人民、造福人民。“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互联网+”条件下，无论是个人、社会，还是企业、政府，都有许多实实在在的创业创新创造需要完成。做服务者，理应坚守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一共产党人最鲜明立场，勇于推动所在部门自我革命，给市场和社会留足空间，切实为公平竞争营造良好环境。对应当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力，应彻底放、不截留，对上级下放的审批事项，应接得住、管得好。切实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有权不任性。再者，行政审批事项要简化程序、明确时限，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用社会矛盾和问题的“除法”，获取人民群众满意度的“加法”，真正为创业创新打开通道，为“互联网+”加油助力。

做理想者。“互联网+”是共产党人在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征程上，所迎来的一个崭新机遇，是通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一跃。尽管“互联网+”于我们还极其陌生，但它已不可避免地来到我们身边，如影随形，相生相伴。我们只有坚定崇高理想，勤于学习、勇于创新、甘于服务，才能托举起梦想天空中“互联网+”美丽的彩虹。

（作者单位：河南省商丘市委党校）

苏轼“八面受敌”精读法

□曹 猛 刁兴泽

苏轼号东坡，宋代著名文学家，其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勤奋而科学地读书使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通古博今。苏轼有自己的一套读书方法，尤其是精读，他独创了“八面受敌”精读法。这种读书方法使他受益无穷，也历来为古今学者所称道。

所谓“八面受敌”精读法，苏轼在《寓简》卷八中作了详细介绍：“卑意欲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读之。书之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尽读，但得其所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做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以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愚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也就是一本书特别是经典书籍，包含着多方面丰富的内容，人们可以从不同的需要或不同的角度反复研读，以解决不同的问题，这样步步深入，就能读懂整本书籍，书就读“厚”了。这是他长期读书经验的总结。苏轼在谈到他读《汉书》经验时说：“吾尝读《汉书》矣，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财货之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窍矣。”这是苏轼运用“八面受敌”精读法的一个范例。

从苏轼“八面受敌”精读法中的“且只以此意求之，勿生余念”“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和他曾说过的“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可知，苏轼提倡的“八面受敌”精读法的基础在于精读、精髓在于精读。“八面受敌”一词，是苏轼借用《孙子兵法》中的军事术语比喻读书，就是读书如用兵，要做到“我专而敌分”。如果八面受敌，则不应八面出击，而要集中优势兵力击敌于一面，以众击寡，一次一得，各个击破，实为绝妙之读书方法。例如阅读《西游记》，第一次可以以唐僧专心取经为需要或视角精读，第二次可以以孙悟空除妖降魔为需要或视角精读，第三次可以以猪八戒取经三心二意为需要或视角精读等。这样，按需要或视角精读，逐个解剖研究，就容易“各得其所”，就可以将书读懂、吃透。很显然，“八面受敌”精读法，不是浮光掠影地泛览，更不是走马观花地涉猎，而是对某一著作集中精力和心力，做到“一意孤行”，各个击破。清末学者李慈铭称之为：“诚读书之良法也。”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中称赞说：“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按照现代科学理论来审视，“八面受敌”精读法包含着“运筹学”思想，即如何科学地运用自己的力量，使智能达到最高峰。按照现代科学方法而言，就是分析法和综合法在读书方法上的巧妙运用。这对于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以问题为导向，着眼于问题，带着问题去学习原著、学习经典著作具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山东省茌平县委党校）

文史天地

刊址：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电话：（010）62805132 邮政编码：100091 订价：全年88元 订阅：本报发行部 发行部电话：（010）62806227 照排：中央党校报刊社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